



图为吉平(图左)2012年与吉林大学教授朱永刚(图右)在哈民遗址发掘现场。

吉平,平头,平脊,平实,人如其名。可如果了解了他的职业、知晓了他的业绩以后,就不仅仅是这一印象。

“西辽河文明曙光”探源人

朋友,你去过哈民遗址吗?你看过那个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环境聚落吗?那些保存完整的房屋碳化木质构架,那些房址内大批人骨遗骸,那些精美绝伦的出土玉器、陶器,无一不令人震撼!

这就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专家吉平研究员的考古杰作!

吉平,1962年出生于大青山脚下敕勒川上的呼和浩特市,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现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专家,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作为内蒙古乃至全国知名的考古专家,在吉平所主持的考古发掘中,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双新”遗址——哈民史前聚落遗址和南宝力皋吐墓地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一片栽满五角枫的沙坨子上,南望西辽河,北靠新开河,遗址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

哈民遗址坐落在西辽河流域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一片栽满五角枫的沙坨子上,南望西辽河,北靠新开河,遗址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

2010年春,在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一个名叫哈民艾勒的嘎查,一位放羊牧民偶然在羊蹄子刨过的沙地上发现了一些陶器残片,于是他用手接着往下挖,最后挖出了一个完整的陶罐。

一时间,“沙地出宝了”的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获知此消息后,联合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于2010年至2014年对哈民遗址进行了连续大面积、有计划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主持这次考古发掘的就是时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吉平。

就在这个遗址,吉平风餐露宿工作了5年多。他回忆,当年他和考古团队刚到哈民嘎查时,周围是一片沙坨子,坨子南边有一片树林,树林边儿上有很多窑坑,于是,他们就把发掘地点选在这里。

随后,吉平他们在村子边儿搭了两顶帐篷,算是安下营寨。村子到发掘地点将近十里地,没有路,吉平和十几个工作人员每天来回趟着沙子走,路上要耽误很长时间,十分不便。

让吉平没有想到的是,科左中旗领导十分重视这次考古发掘,他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短短20几天就解决了修路、拉高压线、打深水井等问题,后来又盖了个12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子,这让饱经风霜的考古团队激动不已,至今心怀感激!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经过5年多的不懈工作,吉平和他的伙伴们发掘总面积达8200余平方米,共清理出房址81座、灰坑61座、墓葬14座、环壕2条,出土石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等文物2000余件,出土碳化的黍、粟、大籽蒿、大麻等植物种子80多万粒,人骨205例。



图为吉平2020年在重庆合川钓鱼城考察。

吉平说:“经考古发现,哈民遗址距今约5500至5000年,是西辽河流域一处大型史前环壕聚落遗址。其价值可以概括为‘三大史前奇观’。”

第一奇观,哈民遗址是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在北纬43度以北地区发现的史前聚落,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完好、遗迹现象之震撼、出土文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奇观:遗址内发现成排的房址,以及十几座因失火坍塌、相当完整的房屋木构架痕迹,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构架情况,这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史前聚落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第三奇观:房址内发现大批人骨遗骸,其中一座仅18平方米房址

哈民之“民”

新华社记者 丁铭

内,就发现97具人骨遗骸,令人触目惊心,堪称中国史前之最。

哈民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过去20多年了,如今再谈及这次考古发掘,吉平认为哈民考古发掘的价值远远不止以上三方面,已经有了更深刻、深远的认识。

吉平说:“我以为,哈民考古最大的价值是,通过对这里的陶器、陶器组合,以及陶器组合反映的这种文化整体面貌研究发现,这个史前遗址发掘和发现充分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就已经和北边松嫩平原,南面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有了很深入的或者很深刻的交流、交往和交融。”

吉平在考古工作中的表现是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可在学术研究探讨上却极为倔强,甚至偏执。

在哈民遗址,最令人震撼的就是那些碳化的房屋梁架木质结构。如果按照传统的田野考古要求操作规程去做,按地层像翻书一样一层一层扒皮儿似的发掘,这个堆积物是不能留存的,清理过以后就必须铲除掉。

可是,吉平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这么做可能对文物是一种破坏行为。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经过将近一年的摸索,最后保留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遗存。



南宝力皋吐墓揭秘人

南宝力皋吐,蒙古语“南边的泉水”之意,简称“南泉”。与哈民遗址一样,南宝力皋吐墓地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一片沙地上,2006年的秋天,吉平带领联合考古队进驻这里,把地征下来后就开工了。

吉平说:“当时已是九月份的天,都上冻了,很冷很冷的,开挖没两天就开始下雪了。这也预示了这次考古发掘的不寻常。”

第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在一个叫班布尔的老人身上,他是墓地征地的主人,一开始挺好,满口答应让考古队用他的地,吉平他们也很痛快,就把征地钱给了他。

可后来每年征地款一花完他就撵考古队走,把工地给停了。反反复复三四次,直到最后一年(第四年)快挖完了,班布尔的一个意料之外举动让吉平对他充满了敬意!

一天早晨,班布尔突然来到考古队,对吉平说:“我看你们也挺难的(那时候考古队也挺难,经费来得很晚,有时候也断顿),我自己也存点钱,你们先用着,啥时候有了再给我。”

说罢,班布尔把系在蒙古袍上的腰带一圈儿一圈儿解下来,从里边儿拿出大概三四千块钱给吉平,让吉平激动得热泪盈眶,推搡多次后还是谢绝了。

吉平说:“那以后再没见过这位老人。听说从我们那儿走了以后,就去旗里边儿看病了。他是肝癌晚期,最后这个老头儿在我们工地还没结束时,就在旗医院去世了……”

第二件不寻常事发生在2007年,那年是个大旱年,将近有100天没下雨,地上的草一点儿都没绿,全是枯黄枯黄的,草地板结跟石头一样硬,挖也挖不动,考古队员手上都打了水泡、血泡,裤子也都磨破了,脚丫子有的指头都露出来,就这么着把那一夏天扛下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牧民日子也不好过,养羊草场都不好,庄稼地也都长不出来,他们认为考古队在那儿挖墓地,把当地的风水给破坏了。于是,嘎查里面一位有头有脸的兽医带领着十几个村民,围着工地转圈祭祀,引得公安人员前来过问。

直到这时,公安局才知道考古队在这里考古发掘,从此开始积极配合考古队的工作。后来,考古工作队来过盗墓的和抢东西的,公安局知道后过来把他们一块给撵跑了,这以后工作就走入正轨,两三年都非常顺利。

从2006年开始算起,由吉平带队的联合考古工作队对南宝力皋吐墓地和遗址进行了4年连续性大规模的野外工作,共揭露遗址面积1万多平方米,发掘清理墓葬295座,出土陶、石、玉、骨、角、蚌等各类文物1800余件。

吉平说,南宝力皋吐遗址是目前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现规模最大、遗迹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群。墓地出土随葬品中陶器和玉器数量最多。

他介绍,南宝力皋吐遗址考古最突出的发现是,出土陶器的文化因素比较复杂。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几支重要遗存——小河沿文化、偏堡子类型、小拉哈一期遗存的共存实例,为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材料。

吉平说,20世纪初昂西文化以及八九十年代很多考古发现,让人们们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产生了一种迷惑,因为各个地方类型特别多,中间还没有联系,留下很多迷局。而南宝力皋吐墓地的发掘、发现、研究、阐释,能够像一把钥匙一样把很多谜团解开了。

同时,这个遗址的发现,还能让人看到中华多元一体是怎样形成的,是怎样走向共同、走向统一,走向相互之间交流、交往、交融这样一种大趋势和格局的。

“站在中华文明高度”的政协委员

由吉平领衔“双新”遗址双双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六

大发现”;2011年“哈民史前聚落遗址”又荣获该年度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双新遗址”长达近10年的考古发掘,占了吉平后期绝大部分考古生涯,也使他深深融入西辽河流域考古中,深深融入通辽这片土地中,更是获得了“哈民之民”的称誉。

由于吉平在考古工作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18年,他当选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从此,他的肩上又多了一副政协委员的重担,多了一份关注文物考古问题的责任。

“两会”,是每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党和国家献言献策的一个契机,吉平拿出考古研究的劲头,每年两会前夕都会腾出时间和精力专门收集、整理提案和社情民意材料,聚焦文物事业,提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提案和建议。

有调研就有发言权,有发言权就行使建言献策权。2018年、2019年两年,吉平连续提交了《关于加强内蒙古民族文化传统村落调查与保护的提案》《关于鼓励收藏家到乡村开办收藏展馆助力乡村振兴的提案》,均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和认真办理。

2020年,吉平又提交了《关于在文物征集取消由提供者出具文物来源证明的提案》,成为国家文物局修订《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和制订《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的重要参考。

去年全国两会上,吉平就加大对革命旧址的保护维修经费投入,提升反映百年党史的重大事件遗迹、重要会议遗址、重要机构旧址、重要人物故居的保护展示水平等问题提交提案建言献策。今年的提案是《边疆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吉平从事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近40年,一直在内蒙古工作,对边疆考古有着深刻认识,他表示:“边疆考古发掘阐释工作要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上来思考。”

为何强调要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思考边疆考古发掘阐释工作?吉平说,考古发掘和阐释边疆地区丰富的历史遗产,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边疆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故事,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和文化自信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边疆地区的文物遗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记录了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生产生活轨迹,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

吉平说,中国地域广大,边疆地区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草场和戈壁沙漠。各地区,尤其边疆地区的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一发展过程,原因有待深入挖掘和认识,以便全面了解我们民族、国家和文明是如何走到今天。

他举例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经过考古发掘,以实物证据确认北庭故城外城为唐代构建,展现了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历史地位;内蒙古发掘的元上都遗址,为自治区内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融合的产物,再现了元朝繁荣的社会形态、融合的民族关系,以及开放包容的繁荣文化,其城址设计和规划体现了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延续。

聚焦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物,是吉平在全国两会上最关注的内容。在他看来,考古发掘可以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自信、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吉平说:“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内蒙古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吉平建议,配合“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制定实施边疆地区重要考古规划和实施办法,围绕史前文明、中华文明基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一系列课题展开考古发掘,在“十四五”期间,也可以划地区、分阶段地开展边疆考古发掘和阐释。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图为吉平2021年在呼伦贝尔根河市调查鲜卑遗址考察。